

绪 论

一、国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对象

关于学科的区分和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毛泽东曾有一段名言：“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①我们要正确认识国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对象，就必须首先正确认识国防经济学说史的特殊矛盾性。

国防经济学是一门处于军事科学和经济科学交叉地带的新学科。它所研究的是国防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从国防经济学的本质属性来看，它是经济学的一个门类，是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交通经济等学科处于同一层次的学科。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环境，处于不同阶级、阶层地位的人有不同的立场和观察问题的方法。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家对国防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仍相当不一致。部分人认为，国防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为工具分析研究国防及与国防有关的问题的学科，其研究对象相当广泛，涉及到军费、国防工业、国防采办、军备竞赛、军品贸易、军事联盟等许多领域。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领域还存在“窄派”和“宽派”之争。“窄派”认为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防领域的经济问题，而“宽派”则认为研究对象还应该包括国防对环境的污染问题以及非常规暴力形式的冲突问题（如恐怖主义、暴乱、游击战）这里面也有经济学的原则。这些因素使国防经济学形成以后出现的各种流派异彩纷呈，各具特色。如何认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防经济理论的不同特点，并从中理出其发展变化的脉络，就成为国防经济学说史这门学科的研究任务。

国防经济学说史是一门史学。它所要阐明的基本问题是，国防经济学在怎样的条件下形成，又在怎样的条件下发展，它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矛盾性、同一性，它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它自身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不同代表人物及其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等等。因此，国防经济学说史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309 页。

是经济理论发展历史的一个分支。

国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对象，是国防经济学形成、发展的历史。它着重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国防经济理论观点，他们的理论的特点、地位和形成的主客观条件，比较各种观点的联系和区别，从历史的发展中研究国防经济学各种范畴和理论体系的演变过程，寻找国防经济学历史发展的内在线索。

由于国防经济学说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国防经济学说史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国防经济学的产生，即国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登上历史舞台的外部环境、内在原因、表现形态等，然后是这门学科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等。至于国防经济学的历史渊源的追溯，只能作为国防经济学说史研究的一个“铺垫”或“前奏”。如果把“铺垫”或“前奏”作为国防经济学说史的主体来研究，就可能是本末倒置。

二、国防经济学的历史渊源

（一）古代战争经济思想述要

国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如果从 1914 年赫斯特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算起，至今还不足百年，但它的思想渊源却同战争、国防一样久远。国防经济理论是来源于国防经济实践的。在原始社会末期，战争增强了军事首领的权力，首领由选举制逐渐演变成世袭制；防御外敌的城墙和壕沟逐渐变成了国家的“围墙”。国家产生之后，设立了对内镇压、对外防御的“公共权力”。构成这种权力的因素，不仅有武装的人，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即装备、费用、设施等经济因素。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认识战争与经济、国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一些朴素的战争经济思想。

兵农合一思想在中国较早体现在姜尚的军事思想中。兵书《六韬·龙韬》中对此就曾作过具体生动的描述：“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耒耜者，其行马蒺藜也；冯牛车輿者，其营垒蔽橰也；锄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簪笠者，其甲冑干楯也；锬斧锯杵臼，其攻城器也；……故用兵之具，尽于人事也。”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战争中所需要的攻守器械，可以在人民的生产活动中发现。耕田用的犁可以作为防御时的障碍物；马车、牛车可以作为营垒的防护物，锄头等器具可当做士兵使用的矛戟；生产时穿戴的笠帽可以作为士兵的盔甲，锄、锹、斧、锯、杵都可以作攻城用的兵器。这一番叙述，生动地说明了战争的器械同生产的器具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原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平时可以用于生产，一到战争临头，可以立即转化为战争工具，满足战争的需要。

关于兵农合一的思想，在古代西方国家也存在。例如，古罗马国王塞维·图里乌（前 578—前 534）规定，罗马公民就是士兵，平时劳作，战时打仗，武器自备，粮食自带。公民分为 5 等，各等级在战时所带的东西划分得清清楚楚。

富国强兵思想在中国较早地体现在管仲的学说中。管仲认为，“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①他从当时农业经济的社会基础出发，论述了富国的途径和强兵的方略：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富国的主要措施是发展农业、增加粮食储备。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他的这一思想，一直为我国历代思想家所推崇。直至晚清，一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激进派政治活动家（如唐才常）仍然宣传这种观点。唐才常认为：“夫欲树木者，必培其根，欲强兵者，务富其国。”^②

农战思想是古代重要的战争经济思想之一，商鞅在这一领域颇有造诣。他说：“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他还认为：“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③当时，农业是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农业的兴衰，关系到国力的强弱，王朝的安危。所以商鞅把务农人员和非务农人员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当做衡量国力强弱的标志，认为国家不重视发展农业，就十分危险。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思想在实践中广泛应用。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在他的《孙子兵法》中指出：“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孙子的这些精辟思想，一直为后人所用。因粮于敌的思想也为古代西方军事家所推崇。古罗马杰出的军事家凯撒（前 100—前 44）在与庞培作战时曾说：“让我们以敌人丰富的资源解决我们军需的缺乏”。他多次在实践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思想。

军事屯田思想是中国战争经济思想的精华，一直指导着中国历朝历代的国防活动。最早提出屯田理论并从事屯田实践的是西汉将领赵充国。为了长期抵御匈奴的入侵，赵充国在边塞地区留下士兵和刑徒，开垦土地，生产粮草，屯田治塞。后来，曹操、诸葛亮以及明清时代的一些军事

① 《管子·治国》。

② 《唐才常集·兵学余谈》。

③ 《商君书·农战》。

政治家，都运用屯田的方法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军事实力。

（二）近代资产阶级战争经济思想述要

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寻找商品的海外市场，对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保障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对外采取战争这种暴力手段，砸开了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大门。战争不仅给资产阶级国家带来繁荣，也使资本家的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战争逐渐成为资产阶级从事的一种事业。一方面他们愿意支出一定的费用来扶植这种事业；另一方面，他们又要通过这种事业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于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军事和战争问题，国防经济理论研究被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筹措国防经费的方法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理论主要包括下述几个观点：（1）战费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分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战争规模也逐渐扩大，完全靠参战者自备武器和军需品已经不大可能。工匠们一旦离开自己的工作奔赴战场，其经济来源即告枯竭，必须由公众来供给，因而产生了“战费”。（2）国防开支是国家的首要职责。斯密在 1776 年写道：“国家的首要职责，即保卫社会使其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或侵略，只能使用军事手段去完成。”为此，国家必须进行一定规模的军事拨款，所以，国防开支也就同时成为政府的首要职责。（3）常备军的开支，是维护国家文明的条件。斯密反对“常备军是对自由的威胁”的说法。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战争是最高尚的艺术，文明国家若仅靠民兵来保卫国家，则要承担风险。不过斯密并不反对组织民兵，而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4）战费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争艺术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斯密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武器装备越来越复杂，采购费越来越高，训练、运输和补给等费用也大大增加。（5）国防费筹措的原则是社会成员各尽所能。斯密认为，虽然国防是整个社会的公益事业，但国防费不能采用按人平均分摊的办法，而应根据各成员收入的多寡，采取“各尽所能”的原则。（6）文明社会维持兵士的费用，都是由非兵士的劳动者负担。因此，兵士的数目就不能超过这些劳动者除了维持他们自身及国家官吏外所能维持的限度。根据他的推算，近代文明各国，“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 1% 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①

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大师大卫·李嘉图在战费理论上也有许多新见解：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 第 259 页。

(1) 公债筹款是促使战争发生的原因。政府靠公债来筹款比较容易，而且是在以后的时期中偿还。因此，增加了政府进行战争冒险的可能性。

(2) 筹措战费的合理办法是征税。靠征税来筹集战费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不把负担留在以后；二是可以牵制政府不轻易卷入战争，或促使政府早日从战争中脱身。

(3) 战争与和平互相交替时，会给国家的经济生活带来严重的困难。他说：“长期和平以后开始战争或长期战争以后开始和平，一般都会在工商业上产生很大的困难。它会大大改变各国资本以前投入的行业性质。这些资本在新环境使之成为最有利的投资场所中稳定下来以前，需要一段时间。在这一期间，很多固定资本将得不到使用，也许会完全损失，工人则不能充分就业。这种困难时期的长短要看大多数人是不是愿意放弃他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的投资行业。”^①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与李嘉图是同时代的人。他认为战争是对人口增长的不可缺少的限制。社会经济繁荣，民族精神高涨，会鼓励穷人不顾后果地生育，导致人口膨胀。人们为了寻求食物和生存空间，必然爆发战争。战争会提高人口死亡率，降低人口出生率，从而起到抑制人口增长的作用；战争会带来经济的短期繁荣，但战时经济增长越大，战后资本过剩越严重。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把他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带进了战争经济理论。萨伊认为，一个战士投入战争之前，社会（包括他的父母）对他进行了大量投资。从出生之后的衣食住行，到成长阶段的训练教育等，花去了社会大量费用。他独立之后，社会应收回这笔投资。可是当他在战争中阵亡或致残，则不仅不能偿还投资，可能还要变成社会的负担。因此，战争耗费必须考虑伤亡者给社会带来的无法挽回的损失。另外，萨伊不同意斯密把士兵称作非生产性工人的说法。他认为，士兵是“破坏性工人”，他们不仅消耗维持自身的产物，而且，破坏别人艰苦劳动的成果，而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好处。

不仅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有一定的认识，而且不少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一代枭雄拿破仑就有“以战养战 就地补给 多种手段聚财”^②，打仗需要的第一是金钱，第二是金钱，第三还是金钱”等著名论断。瑞士的军事理论家若米尼，对以战养战理论有相当透彻的认识。他说，军队的统帅，应善于利用其所入侵的国家的一切资源，以保障其军事行动。关于国家财政与战争的关系

① 大 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第 548 页。

系，他的认识不亚于各古典经济学家。他说，决不应该忘记国家的财政状况。应把财政状况同决定战争胜负的其他军事因素等同看待。

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中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战争的胜败取决于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战争的经济基础在于民众，民众的经济支持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以战养战、集中兵力夺取敌人最富裕的地区是达成军事战略目标的重要方法；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是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基本因素。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军事经济思想述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国防经济学方面的专著，但在他们数以百计的军事学和经济学的著作中，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地继承了社会各个时期关于战争和经济相互关系理论的优秀遗产，第一次揭示了战争和经济相互关系中的内在的本质联系，为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思想概述如下：

1. 经济是暴力的基础，暴力仅仅是手段，而经济利益则是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战争和经济的关系中，经济是基础，是本源的东西，战争（包括进行战争的物质力量）是由经济决定的，是实现经济要求的手段。阶级出现和国家形成之后，战争成了解决阶级对抗或向外扩张掠夺的一种手段。因此，作为暴力的形式，战争同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暴力仅仅是手段”，“经济利益是目的”来表述。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更具“基础性”。同时，“暴力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占有大工业这一强大的手段。”^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从根本上纠正了资产阶级学者们把暴力看做是目的，把经济看做是实现暴力的手段的错误观点，使国防经济学的研究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2. 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催生了为掠夺而进行的战争，掠夺财富和保存旧的经济制度是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没有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会有私有财产，因而也就不会有以掠夺财产为目的的战争。战争是一定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战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也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消亡。

3. 武器装备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武器装备过时和贬值的速度加快。恩格斯说：“装备是基础，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版，第175页、189页。

它又直接取决于生产阶段。’^① 他在《炮兵》、《步枪史》等著作中通过对武器装备发展历史的分析，揭示了武器装备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现代生产力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使武器装备的价值呈几何级数下降。这是工业革命以来军事史和经济史共同证明了的史实。

4. 军队的数量和质量、编制和编成，最终都是由经济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作为战争物质力量的军队，它的存在和发展也是由经济决定的。恩格斯指出：“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没有任何东西比军队的编成、编制、装备、战略和战术更加依赖于经济条件了。”^② 军队的规模、军人的数量和质量，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也有密切关系。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资产阶级和自由小农制度下可能召集的兵员数量在人口总额中的比重，要比在经济落后的封建制度下可能召集的兵员数量在人口总额中的比重高得多。因为前者提供的劳动生产率大大超过后者，从而有可能有更多的人口脱离生产领域转入军队或其他领域，有更多的剩余产品可由民用转入军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的兵员数量与该国的人口密度成正比例；与交通条件的好坏成正比例；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曾在许多著作中分析了军队的编制、编成同武器装备的改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5. 作战方法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变革而改变。恩格斯在分析大量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生产力的增长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 新的生产力同样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③

6. 有些新的经济关系首先在军队中诞生。雇佣制和薪金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广泛使用的经济关系。它对瓦解封建行会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起了重大作用。可是，恩格斯经周密考证后发现，这些经济关系首先是在军队中产生的。埃及在公元前就有雇佣兵存在，以后逐渐发展并将这一关系传入社会生产中，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7. 暴力既可以破坏经济、阻碍经济的发展 又可以起革命作用 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战争这种暴力形式，在历史上也起着一种革命的作用。它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第 1 版 第 68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第 1 版 第 68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第 1 版 第 56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5 月第 1 版 第 223 页。

8. 军队的消费属于非生产消费，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军队应减少到最低限度。马克思引用斯密的话说：“士兵的活动生产保卫，但不生产谷物。如果国内建立了秩序，那么土地耕种者就会像以前一样继续生产谷物，但不必另行生产士兵的给养，从而不必生产士兵的生命。士兵像很大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一样，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消费。”^①显然，马克思认为军官和士兵的劳动有益于社会安全，但不属于生产性劳动。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战争和经济相互关系的学说，揭示了二者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三、国防经济学的产生

尽管在古代就有国防经济和国防经济思想，但它们是零碎的、包含于其他学科之中的，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要有本身的理论体系，要有独立的研究对象，要有完整的理论著作和代表人物，要有揭示事物本质的理论分析和指导社会实践的方针政策。国防经济学产生于何时，这在理论界是有争论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主要观点。

（一）以 1921 年庇古的《战争经济学》为代表的观点

不少人的观点是，国防经济学产生于 1921 年，代表人物是庇古，代表著作是庇古的《战争经济学》。持此观点的有日本国防经济学家石井洋。他在《日本国防的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战争经济学是研究战争与经济关系的科学，而全面研究战争与经济关系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开始的，它的先师是久负盛名的福利经济学家庇古。

1988 年中国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防经济学 60 年》一书也持类似的说法：“1921 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庇古适应上述客观要求，出版了《战争经济学》一书，系统地总结了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时经济经验，叙述了战时经济运动的客观过程以及平战相互转换的一些理论原则，使国防经济学取得了最初的独立形态。”该书认为，20 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重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成为当时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中心议题，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想谋求世界霸权地位，发动了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往的战争只是处在“战争手工业时期”，战争手段比较简单，战争消耗量也不大，那时只是交战国双方的军队置于战争行动之下，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只局限于战费的筹集和战区的经济活动。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战争工业化时期”进行的，它把交战双方的全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I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1 版，第 300~301 页。

居民都卷入战争活动中，整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都用来进行战争。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军力的强弱，而更重要的取决于交战双方的经济力量能否支持这场大规模的战争。经济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超出了以往的时期，用传统的办法已经不能解决战时出现的各种经济问题，也不能解决由战时转变到和平时所面临的复杂经济问题。社会经济的发展，战争对经济的依赖空前加强，要求经济科学除了有研究平时状态经济过程的传统经济学外，还需要有专门研究战时经济过程，以及战时向平时、平时向战时转化的经济学，而国防经济理论的历史发展也已经为战争经济学的产生准备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独立形态的国防经济学。

（二）以 1960 年希奇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为代表的观点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不少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家认为，国防经济学产生于 1960 年，其标志是希奇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而不是 1921 年庇古的代表作《战争经济学》的出版。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 1921 年庇古的《战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战争经济，而不是国防经济。很显然，战争经济与国防经济是交叉关系。战争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如何使战时动员最大化，以充分保障战争胜利，即战争保障经济学。战争经济学的范围有防务与非防务之分，而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包括战时和平时的国防经济问题。同时，战争经济学缺少一个效益的概念。

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如何对有限的国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和选择，以实现最佳的国防经济效益，而庇古、鲁登道夫等人对战争经济学的研究均未涉及到效益问题。对战争的效益以及战争对国民经济产生影响的效益，尤其是对第二种效益，战争经济学很少考虑。

二是战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局限性。战争经济学主要是应用宏观总量分析法，数学方法应用很不够，基本上无量化分析。

三是战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具有局限性。战争经济学一般只研究一个国家的战争经济问题，不足以提供一般性的结论。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些应急性、对策性研究没有普遍指导意义。

希奇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研究内容相当丰富，对国防经济潜力、国防财力、国防经济效益、军事联盟、国民经济动员与复员等问题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因而在理论体系上支撑起国防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而且该书的研究内容体现了核时代的特点，涵盖了冷战时期西方所关心的国防问题。该书开始把现代数学（例如运筹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国防经济学中，使国防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产生了飞跃。

（三）以 1914 年赫斯特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观点

本书所持的观点与上述看法均不同。本书认为具有独立形态的国防经济学产生于 1914 年，其代表著作是赫斯特在 1914 年出版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扩军备战进入高潮。各国均把大量经济资源投入战争准备，使正常的经济运行受到影响。各国经济学家纷纷研究和解释当时世界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战时经济理论成为理论界的“宠儿”。赫斯特就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出版了颇有见地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关于此书出版的背景、理论准备、主要内容等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详述。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战争经济学既研究战时经济，又研究平时的经济准备，既研究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又研究战争产生的经济原因，其研究对象仍是战争与经济、国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国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也包括了这些内容。不过，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在平时和在战时有不同的侧重点。平时侧重于经济准备、军民结合、运行机制、经济效益等，战时则侧重于经济动员、经济统制、资源筹集、资源配置等。因此，可以说战争经济学是国防经济学的初级形态。国防经济学涵盖战争经济学。我们不应该把战争经济学与国防经济学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

思考题

1. 国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是什么？
2. 斯密和李嘉图的战费理论有哪些主要观点？
3. 马克思和恩格斯军事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4. 你认为国防经济学产生的标志是什么？

第一篇

初创时期的国防经济学

国防经济学能够作为一门学科问世，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它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军事综合发展的产物，也是国防经济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扩展而结出的硕果。

这门学科的产生，是以英国经济学家赫斯特于 1914 年出版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为标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出现了著名经济学家庇古更加系统化的《战争经济学》。以这两本专门著作作为代表，形成了初创时期的国防经济学，首次为这门学科树起了历史的丰碑。

初创时期的国防经济学，形成了它自身的一些特点：一是以现实的战争为着眼点。在经济学家看来，战争这个“怪物”以其特有的方式破坏经济的正常运行，给民众带来“灾难”。他们以经济学家特有的眼光关注战争的准备和实施。规模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实施和后果，就成为他们注视的焦点。二是以战争的资源筹措为主要内容。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中，战争对资源的大量消耗，更为直接和明显，人们比较关注战费的来源和筹措。因此，资源的消耗、战费的筹措、战费对财政和经济的影响等，就成为初创时期国防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 赫斯特的战争经济理论

第一节 赫斯特战争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

F.W. 赫斯特，是英国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这位极富才气的编辑，于 1914 年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这本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专著，在国防经济学说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问世，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国防经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大机械兵器时代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它以电机、内燃机的出现为标志，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而且为军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内燃机的发明，特别是汽油机、柴油机的发明，为广阔的战场输送了大批的坦克、汽车、舰船等机械化兵器。机械化兵器的广泛使用，在国民经济中创造了一些新的军事工业部门，如舰船制造业、汽车生产工业、坦克加工工业等。1903 年美国莱特兄弟制造出首架飞机之后，在短短的 10 多年中，大批飞机就已翱翔在战场的上空。飞机的出现，不仅为军事家增加了新的作战手段，同时，也为国防经济增加了新的工业部门——飞机制造业。

随着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国防经济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大机械兵器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一批军事工业部门，造就了一批大军事工业企业，也造就了一大批军事工业企业家。这些部门、企业、企业家形成了一个集团，即人们平时所说的“军事工业垄断集团”。这个集团的势力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它可以左右国家的经济政策，可以左右军队的发展，还可以左右外交、国防政策和方针，等等。机械兵器的大量使用，给物资供给和物资运输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此引发了新的后勤保障革命。这种革命不仅关系着后勤保障自身，而且关系着军事战略战术的变化。以上这些变化，都增大了军事开支，使国民财富的相当一部分配置于军事领域。正如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所说：“火器的发明给战争艺术带来的变化，进一步增加了和平时期训练一定数量的士兵和战争时期使用这些士兵所需要的费用。”军事开支的增加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引起政府的关注，引起民众的关注，也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从而引起更多人的理性思考。

二、世界经济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根据列宁的分析，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是：（1）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2）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3）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4）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

世界领土被分割完毕，可是，德国等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不满于现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新老帝国主义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就必然引起战争。战争的准备和战争的进行，引发人们对战争的思考，从而引发人们对战争经济的深入研究。

三、世界政治进入矛盾激化的时代——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

1882 年，新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拉拢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建立三国同盟 即所谓“同盟国”。1892—1907 年间，又逐步形成了英、法、俄组成的所谓“协约国”。这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对立，加速了欧洲各国抢夺战略要地的步伐，也加速了它们扩充军备的步伐。

当时的世界政治，是一片黑暗。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尔虞我诈，玩弄阴谋，根本无法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各大国之间的矛盾，惟一的出路就是战争。为了在战争中夺取胜利，各大国在财政、物资、兵员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当时各大国的军事经济都有长足的发展。这既是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的结果，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准备需求的结果。

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国防经济的发展，既给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好了准备，也为国防经济学的初期形态——战争经济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赫斯特战争经济理论的准备

各大国的经济资源分配，严重地向军事领域倾斜，使正常的经济运行发生了倾斜。这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关注。他们不断地思考各大国把多少经济资源用于军备、应该不应该用这么多经济资源等问题。赫斯特作为敏锐的经济学家，用了大量的精力来关注事态的发展。他收集了大量当时各国军备竞赛的统计资料，并运用经济学理论进行系统的综合分析，得出了许多不寻常的认识。这些认识的文字记录，就是他天才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

但在 1914 年正式出版《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之前，赫斯特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上，已经有了很多较为深刻的认识。这与他的经历和职业密切相关。

《经济学家》杂志，是英国出版最早并最具影响的经济学杂志之一。赫斯特作为该杂志的编辑，接触了大量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掌握了大量的经济统计资料，也编辑了大量颇有见地的经济学文稿。他在不断的学习和研究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济理论知识，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和理论特色。

在欧洲各国积极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1911 年，曼彻斯特举行了一次关于统计学的研讨会。赫斯特以其广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思路，清晰地论述了英国军事财政的有关问题。他的发言，被人们称为“赫斯特三原

则”。在这前后的若干年中，赫斯特收集了大量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军备竞赛方面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对当时各国的国防和经济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这些新的认识，使他的许多论文都具有新意。这些丰富的、新鲜的理论积累，为他“战争经济理论”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难怪英国防务经济学家盖文·肯尼迪在他 1982 年出版的《国防经济学》中将赫斯特称为 20 世纪的亚当·斯密”。

第三节 赫斯特战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赫斯特关于战争与经济关系的论述相当广泛。除了 1914 年出版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之外，以后又有大量的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是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等方面的理论。

一、战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历来是国防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赫斯特在这一问题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他首先指出了 3 种关于战争与经济关系的错误观点：一是认为战争具有经济上的好处，即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二是认为战争可以增加财富，即可以用战争手段来抢夺资源和财产；三是认为战争可以促进经济贸易，即可以用战争手段打开对外贸易的口岸，占领对方市场等。

赫斯特在指出 3 种关于战争与经济关系的错误观点的同时，深入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首先，战争给经济带来的繁荣，只是暂时的。他认为，战争对经济资源的需求，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刺激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增长，但这种增长只是短暂的、虚假的。一旦战争需求的刺激消失，劳动力就会大量过剩，投资就会大量减少。市场上过剩的劳动力同过少的资本相对立，就会给经济带来破坏。

其次，战争带来的债务，是一种最可怕和最有害的非生产性债务。它像私人交往中债主借给纨绔子弟的金钱一样，不仅白白浪费了金钱，而且毁了纨绔子弟本人，或者像金融家贷给骗子的金钱一样，最终使金融家蒙受巨大损失。战争贷款，特别是那些使战争延续的贷款，国家所要面对的除了战死和致残的士兵之外，还有沉重的债务负担。赫斯特在其 1914 年的著作中深刻地指出，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如此规模的军事开支决不可能是再生产性的。它耗尽了国家的财源，加重了税收，使国家的金融和商业活动陷于瘫痪，使公众的福利受到抑制”。

这些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对经济带来的危害的分析，应该说是相当中肯的。

二、战争与财政的关系

关于战争与财政的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赫斯特就已经有大量论述。这以后的许多年中，他对此问题的论述更加深入。概括起来，这一理论有如下要点：

第一，仅就经济意义而言，所有用于陆军、海军和毁灭性武器方面的财政支出，都是浪费。在此，他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明了军事开支的性质，即对于生产来说，军事开支是浪费。

第二，在全世界普遍的、永恒的和平确立之前，为实现这样的和平而支出一些费用，是绝对必要的。这一认识与斯密的观点十分相似。斯密认为，士兵虽然是非生产性人员，但他们在保卫国家免受外来侵略上是必须的。

第三，军事开支的数量，只限于保卫国家的安全，使之免受侵略。任何过度的、挑衅性的军事开支，都必须尽力避免或压缩。赫斯特主张，各国军备都应努力地、认真地、合理地加以限制。同时，应建立严格的财政监督制度，以保证纳税人的税款得到恰当的利用。

赫斯特关于军事财政的 3 个基本观点，是当时经济学界和军事学界中最有代表性、最有系统性的理论之一。它说明了军事开支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之间的某些内在联系，解释了战争准备期间的某些经济现象，回答了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

三、战争与工业的关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的工业发展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and 水平。赫斯特在考察各国军备与工业发展的关系的同时，总结了斯密等前辈关于战争与工业发展关系的理论，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随着工业的发展，昔日军队所使用的弓箭和石弩，已经被火药和步枪所取代。现代工业创造了新式武器。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变化，军队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武器装备的变化和军队组织体制的变化，使现代战争出现了新的情况。

现代战争的胜利，更多地依赖于工程和机械技术，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装备及其相关的战略战术。看得见的、震撼人心的战争的胜负，往往是在不被人们关注的实验室、铸造厂、机械厂中赢得的。

应该看到，赫斯特的上述看法虽然还是初步的，但基本是符合社会经

济发展规律和战争发展特点的。它说明了经济对军事的基础作用，说明了现代工业对军事的最终决定作用。

思考题

1. 赫斯特战争经济理论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2. 赫斯特战争经济理论有哪些主要内容？

第二章 庇古的战争经济理论

第一节 庇古战争经济理论的产生

庇古(1877—1959)是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是剑桥学派领袖马歇尔的高足,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授,并担任过国际经济学会名誉会长、英国通货与外汇委员会委员、皇家所得税委员会委员等职。庇古不但在一般经济理论研究中颇有名气,他的研究目光还每每投向经济学的分支领域,成为两门新学科的开创者。1920年,庇古写成了《福利经济学》一书,首创福利经济学的完整体系,被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紧跟此书之后,庇古于1921年出版了《战争经济学》一书,这本书又使他被后人称为“战争经济学的先师”。

庇古的《战争经济学》在国防经济学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后人有这样的评价:“战争经济学是研究战争和经济相互关系的科学,它进入学术领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事情。可以这样说,战争经济学是在战火的灰烬中诞生的学问。英国剑桥学派的权威、以《福利经济学》等大小名著知名的庇古,在1921年就是这门学问的先驱者。”^①

庇古的《战争经济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自从古典经济学创立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埋头于平常状态下经济运行的研究。然而,宁静的状态第一次被世界规模的大战彻底打破了,战火恰恰集中于常态经济研究的中心——欧洲。在平时状态下运行的经济过程,骤然间被拖入了战争的轨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使得各主要交战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都与战争发生了联系,从而呈现出完全的“战时经济”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时经济”成了一个热门课题。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实际经验为素材,把战争经济学引入学术领域的庇古,是这样给自己提出任务的:在1918年11月11日以前约4年之中,不知不觉的寻常生活,全被摈弃。整个的欧洲,辗转沉溺于战争的苦闷之中。自己不必描写这些不能想像的恐怖时代,这当留待后代

石井洋:《日本国防的经济学》,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23页。